

让中小投资者拥有选择权是分红制度关键

熊锦秋

最近,证监会有关人士表示,强制的、半强制性的现金分红政策有待改进,并提出要“创造条件听取中小投资者意见和建议,增强投资者回报决策的话语权;优化投资者回报外部环境,包括研究试点以股代息、完善股份回购等政策的可行性”。笔者对其中多数观点表示赞同,同时认为,完善分红政策的关键,是要让中小投资者拥有对现金红利的选择权。

应该说,目前现金分红政策存在强制性,但约束强度并不高,主要体现在2008年《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规定中。上市公司公开发行证券需要满足的一项条件是“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也即平摊到每年、将10%左右的利润予以现金分红就可满足再融资条件。另外,2013年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规定,上市公司按不同情形提出差异化现金分红政策,发展

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80%……但这并非强制性政策,因为上市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完全可能是“不分配”,若方案为“不分配”那么80%等数字自然就毫无意义。而且该《指引》虽然规定上市公司若要修改公司章程确定的现金分红政策,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但并没有规定中小股东单独表决机制,由于大股东一股独大或者中小股东参与上市公司治理比例较低,上市公司“分红自治”往往演变为大股东控制下的一毛不拔,中小股东只能被动接受大股东提出的分配修改方案。

《公司法》第4条明确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的权利。第74条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即有限责任公司五年连续盈利但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在股东会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也即对有限公司分红具有一定强制性。不过,《公司法》对上市公司分红却没有类似的强制性规定。确实,从广义来讲,上市公司回报投资者也包括上市公司价值增长的提升部分,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对中小股东来说,分到手里的是钱,股票只是纸,现在A股市场的最大弊端就是大股东关联人等通过隧道挖掘的方式掏空上市公司利益,上市公司赚的再多若不分到股民手里,随时可能被上市公司低买高卖的关联交易变相流走,上市公司不分红,大股东等却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拿走“大红包”。

不同类型的投资者对分红方案具有不同的需求,中小投资者中也有一部分希望将红利留在上市公司促进公司继续发展,但不能否认的是,不少中小投资者因为生活窘迫或出于套牢等原因,希望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大股东提出不派发现金红利的方案,无疑剥夺了这部分中小股东自由选择的权利。分红当然是上市公司自治权利,但这个自治权利决不能搞成控股大股东的专制权利;对于部分中小投资者强烈要求现金分红的新求,监管政策不能漠视。

事实上,2013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称《意见》)提出,上市公司应当披露利润分配政策尤其是现金分红政策的具体安排和承诺,对不履行分红承诺的上市公司,要记入诚信档案,未达到整改要求

的不得进行再融资。不论这个含糊的规定是否含有强制分红性质,但国务院政策毕竟将上市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执行情况与再融资挂上钩。值得注意的是,上市公司是否现金分红并非问题实质,真正的关键是上市公司承诺的利润分配方案是否能够真正落实,中小股东对分红方案是否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要兼顾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和控股股东各方面的利益和诉求,满足不同股东对现金与红股的不同选择,办法就是按照《意见》指引,尽快研究建立“以股代息”制度,也即投资者可根据自身投资或现金流需求决定将利润转为股票投资或提现,通过现金分红和红股的组合效应,那些希望获得现金红利的中小投资者可分得现金,那些声称分红影响公司发展的群体自可选择将利润留在公司、分得相应红股享受公司成长性。当然,其中执行的难点在于,如果有投资者提出现金分红要求,上市公司是否就必须推出“以股代息”的利润分配方案配合?如果是,那么这就基本相当于强制分红制度;如果答案为否,那么提“以股代息”制度又有什么意义,中小股东在分红方面的话语权又如何体现?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大问题。

其实,2013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称《意见》)提出,上市公司应当披露利润分配政策尤其是现金分红政策的具体安排和承诺,对不履行分红承诺的上市公司,要记入诚信档案,未达到整改要求

的不得进行再融资。不论这个含糊的规定是否含有强制分红性质,但国务院政策毕竟将上市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执行情况与再融资挂上钩。值得注意的是,上市公司是否现金分红并非问题实质,真正的关键是上市公司承诺的利润分配方案是否能够真正落实,中小股东对分红方案是否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要兼顾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和控股股东各方面的利益和诉求,满足不同股东对现金与红股的不同选择,办法就是按照《意见》指引,尽快研究建立“以股代息”制度,也即投资者可根据自身投资或现金流需求决定将利润转为股票投资或提现,通过现金分红和红股的组合效应,那些希望获得现金红利的中小投资者可分得现金,那些声称分红影响公司发展的群体自可选择将利润留在公司、分得相应红股享受公司成长性。当然,其中执行的难点在于,如果有投资者提出现金分红要求,上市公司是否就必须推出“以股代息”的利润分配方案配合?如果是,那么这就基本相当于强制分红制度;如果答案为否,那么提“以股代息”制度又有什么意义,中小股东在分红方面的话语权又如何体现?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大问题。

其实,2013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称《意见》)提出,上市公司应当披露利润分配政策尤其是现金分红政策的具体安排和承诺,对不履行分红承诺的上市公司,要记入诚信档案,未达到整改要求

马桶盖O2O与互联网

田楠

新春期间,中国籍“行走的钱包”再次席卷日本列岛,备受中国游客欢迎的马桶盖断货刺激了日本某生产厂商再次扩大生产,其海外市场商品销售同比增长一倍以上。

过去的一年被称为“移动互联网元年”,传统线下产业言必称O2O(线上到线下),纷纷打出“拥抱互联网”的转型战略,春晚一分钟8亿次的摇一摇峰值更是令传统制造业企业看到了起飞的风口。

在企业绞尽脑汁想着怎么借互联网拓宽销售渠道之时,人们正忙着到国外抢购个头不小、价格不菲的日本马桶盖。在这种情况下,O2O一词被人借用,赋予新意思:Offshore to Onshore(国外到国内)。

国外采购并不新鲜,到日本采购电饭煲等小家电已成中国人出国采购常态,只是这次抢购的是马桶盖,给人一种刷新下限的感觉。连马桶盖这种低端的日常消费品都要到海外购买,难怪引发了众人对国内制造业的反思。

其实,马桶盖走俏一方面说明国民消费习惯发生了改变,国人腰包逐渐鼓起来,愿意购买更加优质、方便和耐用的商品,再加上日元汇率一路走低、日本对外国人8%的税率减免和签证门槛降低等政策,才出现了中国人远渡重洋去买马桶盖这种奇观。

以日本马桶盖热销否定中国整体制造业有失偏颇,事实上中国制造业走在世界前端的行业不少,但马桶盖问题确实给国内制造业敲响了警钟。它提醒人们,商业竞争说到底还是围绕“以人为本”来进行,互联网的风口怕不能长以为继。

我们说的这种马桶盖,并不只是两层塑料,它的专业名称叫做“坐便洁身器”,是日本人上一世纪80年代从美国引进并创新的产品,除了具有清

洁功能外,还具有预防细菌感染、预防痔疮、呵护孕妇等方便之处。这种智能马桶盖国内并非不能制造,但国产智能马桶盖的市场占有率不到1%。据媒体报道,国内生产厂家商家也承认,国产智能马桶盖经常一年坏一两个,日本产的三四年也不见得坏。

国内生产厂家大多陷在创新与模仿的两难选择怪圈里。以往打惯了价格战,同等商品拼价格就可以控制市场份额;产品革新得不到应有回报,创新对于企业业绩增长的带动效应过于短暂,一家研发投入后接下来往往是蜂拥而至的仿制,所以比起研发战,价格战还是省时省力,性价比高。

现如今制造业成本优势消失殆尽,多样化的消费习惯正在生成。就拿智能马桶盖举例,荣事达和三洋合资20年,最近合肥三洋被美国惠而浦控股,日本企业也开始提高技术获取的成本,中国企业“以市场换技术”的路子走得有点儿尴尬。据说,国内智能马桶盖生产95%其实都已经国产化,但这种机电一体化的产品,其核心部件的温控、加热、冲水、感应系统的电子感应器,国内技术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问题不仅出在某类产品生产厂家身上,国内商业大环境也值得反思。中国智能马桶盖的不发达也受到了上下游配套大环境的牵制,在日本,智能马桶盖实行统一标准,连公厕也同样适用。而国内一种产品的推广,常由于缺乏配套不完善而失败。就拿智能马桶盖来说,陶瓷原料质量和生产工艺的标准不统一,就让产品质量无法保证;各个城市水压压力不同,给智能冲水的力度设定增加难题;国内南北方水质的酸碱差异和净水系统的不完善,已经让日本的马桶盖产生了使用的“水土不服”。

所以比起拼渠道的互联网O2O,属于制造业的马桶盖O2O(从国外到国内)拼的是过硬的技术、耐用性能和方便的配套设施。只有在创新和完善的商业环境下,制造业的风才可以刮得更久一些。

史玉柱呼吁公开招聘行长 良好意愿实现不易

余丰慧

民生银行股东、巨人网络董事长史玉柱2月21日发微博表示民生银行新行长应该公开招聘。

这已经是民生银行行长“出事”后,史玉柱第N次呼吁民生银行行长应该公开招聘了。成立于1996年1月12日的民生银行,是中国首家主要由非公有制企业入股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按照《民生银行公司章程》第二百零三条规定:本行设行长1名,由董事长根据提名委员会的提名向董事会提议,根据工作需要,设副行长若干名,由行长向董事会提议;上述人选提出后,经董事会审议后聘任。当然,这份公司章程中关于决定高管的规定,是以遵循《公司法》和《商业银行法》以及银监会发布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为前提。因此,民生银行行长由民生银行董事会聘任本不应该成为问题,而如今为何竟然成为了问题呢?这发人深省。

那么,史玉柱为何拼着老命呼吁行长应公开招聘呢?2月2日,作为民生银行股东的史玉柱曾通过微博表示,如果这次领导再委派一个陌生人,空降到民生当行长,股东大会上他将投反对票。他的话里还有另一层意思,即每次委派行长把民生都搞得很难。从史玉柱的态度可以看出,作为中国第一家民间资本发起的全国性民营银行在行长选拔上是否存在领导委派这种情况的,虽然有“董事会

审批后聘任”这样的程序,但有可能只是一种形式。

不过,史玉柱呼吁民生银行行长公开招聘的想法估计很难实现。因为按照《民生银行章程》规定,行长由董事会直接聘任,如果公开招聘的话,需要修改《章程》,这很困难。

史玉柱“威胁”说,如果这次领导再委派一个陌生人,空降到民生当行长,股东大会上他将投反对票,其实也是一句空话。因为,《章程》里没有规定行长需要经过股东大会通过,而是董事会直接聘任。史玉柱虽然是十大股东之一,但不是董事,根本就没有投票权。按目前的《民生银行公司章程》,在这次行长选拔上,史玉柱只有权利在网上大声呼吁而已,除此以外完全无能为力。史玉柱虽然是十大股东之一,但他要求公开招聘的梦想不易实现,即使真的公开招聘了,也大多一种巧合或者领导善心大发而已。

过往,民生银行存在“领导委派一个陌生人,空降到民生当行长”的情况,令人太不可思议了。民资发起的银行在行长选拔上竟然如此,那么,何谈国有商业银行高管公开招聘呢?何谈国有金融深化改革呢?民生银行行长选拔的窘境不禁让人怀疑:这几年商业银行改革特别是银行的公司治理改革,到底取得了哪些进展?民资银行的民资股东们竟然决定不了它的高管人员,这是一个奇葩现象,也是一个令人沉思的问题。

外企撤离短期考验中国经济

谭浩俊

据媒体报道,春节前夕,日本知名钟表企业西铁城在华生产基地——西铁城精密(广州)有限公司宣布清算解散,千余名员工解除劳动合同,限期离厂。与此同时,微软则计划关停诺基亚东莞工厂和北京工厂,并加速将生产设备运往越南工厂。微软在东莞和北京两地的工厂,将总共裁员9000人。

其他一些知名外资企业,如松下、日本大金、夏普、TDK等均计划进一步推进制造基地回迁日本本土。优衣库、耐克、富士康、船井电机、歌乐、三星等世界知名企业则纷纷在东南亚和印度开设新厂,加快了撤离中国的步伐。

曾经的世界制造工厂、制造高地,为什么会面临如此严峻的外企撤离问题呢?如果说2008年的那次外企撤离,还可以用外企本身发展遇到了困难,投资出现了问题来解释和说明的话,此次外企撤离,则有着更多现实的原因。一大批国际知名企业撤离中国,让我们感

受到了一些不太轻松的东西。这些因素给2015年的中国经济增加了诸多不确定性。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稳增长措施,特别是投资,可以说一轮接着一轮,但经济增长不如人意。特别从去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又步入了下行通道。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不仅不能为稳增长提供支撑,反而成为了经济稳定增长的拖累。

以制造业为支柱站立起来的中国经济走到制造业成为拖累的地步,与最近十余年来的经济战略失误有关,推行以房地产业为主的虚拟经济导致了中国经济的严重失衡。虽然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经济的基础是非常薄弱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一段时期内,中国是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牺牲环境、资源和压榨劳动力价值推动经济增长,但只要遇到成本优势的消失,出口导向型经济就没有生命力。

春节抢微信红包成为新年俗



登录微信抢红包,春节互贺有新招。你用手机找乐子,我用网络玩营销。马云博弈马化腾,人潮追捧微信潮。宽容对待新年俗,自由参与走着瞧。

赵乃育/图
孙勇/诗

以房地产和城市建设为代表的投资拉动方式,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也只能起到阶段性、短期性作用,而无法使经济步入可持续发展轨道。中国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依靠实体经济、依靠制造业,但在房地产业泡沫式发展的十余年里,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升级换代被耽搁了,中国经济出现严重的“空心化”状态。

外企大量撤离中国,与制造业能够提供的利润和回报急剧下降有关。想一想,中国的民间资本都不愿再在制造业呆下去了,外资凭什么要在制造业呆下去呢?更何况,东南亚和印度等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很低。

虽然有一些外企撤离中国,但也不要过度担心,因为外资撤离也与中国的经济转型有关。一方面,微软诺基亚、松下等国际多数企业撤离中国的生产国力绝大多数都是低端制造,也是中国下一步需要调整的产业;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在这些领域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本土企业已经完全有能力与这些国际知名企业抗衡。在这种情况下,

它们的盈利空间和市场竞争力大大下降了。这些外企看到这种情况,及早作策略调整,反映了它们的灵活经营策略,从这个层面来看,外企撤离中国的负面后果也不必过分夸大。相比之下,在中国的外企回流到其母国的现象更需要引起重视。回流的外企,特别是美国、日本、德国等制造强国的企业主要是生产高端产品,这也是下一步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需要重点关注的方面,它们如果大量撤离后果会更加严重。

虽然从事低端制造的外企撤离中国,从长远来看影响不大,但就眼前特别是2015年来讲,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是不能忽视的。中国经济正处于困难状态,如果外企再大量撤离,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新的冲击。所以,如何通过改善投资环境、进一步重视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发展,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2015年,进入了制造业发展的真正考验期。尤其是作为制造业重点地区的广东、江苏、浙江等地,更应当把战略重点放在振兴制造业上,不要再沉迷于通过负债进行城市建设的发展模式了。

莫让“数字化春节” 淡化了过年本义

刘鹏

2015年羊年春节在欢声笑语里渐渐地落下了帷幕,机场、车站如织的人流,预示着长假之后的工作日到来,人们要开始投入工作了。

而盘点2015年春节,数字化对这个一年一度最重要节日的影响,显然成了最大的热点。电脑普及了,春节文化生活由现实到网络,更加丰富多彩;手机人手一只,发一条1毛钱的短信拜年冷了,但不用花钱的微信、微博朋友拜年却火了;比之连小孩子才有的过年红包,因为微信等社交工具的“创新”,也成了人人都可以争抢的资源。

属于传统文化的春节,在数字化时代中,也默默地发生了改变,但反过来一看,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影响了春节,让过年有了新形式、新变化、新玩法、新意义,但它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新问题。一个最直观的影响,就是春节越来越没有节日味,而过年也渐渐失去了其本义。

那么春节的实质是什么,过年的本义又是什么?虽然没有统一的答案,但辞旧迎新的跨年喜庆、回家与家人一起吃年夜饭聊天的团圆意味等,却显然是过年或者说春节本质与本义中最必不可少的内容。数字时代影响了过年,同时也淡化了这种过年跨年、团聚等本义。有

的父母沉迷于手机,成了手机控,弄得孩子倍受冷漠,甚至想要离家出走;有的年轻人回家之后,只顾着上网、用手机刷微博、聊微信、逛朋友圈,结果引得老人感叹:“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就坐在你面前,你却在玩手机”;再比如羊年开始流行,而且一开始流行得如火如荼的微信红包、支付宝红包等,大家抢得不亦乐乎,但却有人摔坏了手机,有夫妻闹得要起诉离婚,有老公气恼地对老婆表示:“别摇了,要多少钱给你!”虽说大家抢的并不单是红包,不是几元到几十元不等的金钱,而是一种喜庆气氛,是一种关注与被关注的自我感觉,但将有限的假期,投入到无限地摇红包中去,势必会影响陪孩子的时间,会少了与父母聊天、帮父母干家务的机会等等。过年的跨年意味、团圆意味就必然会少很多。

数字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与文明的内容,数字化春节也是春节内涵多元化的表现。但凡事都有度,若过了,则会出现质变。比如沉迷网络而忽略亲人;比如玩手机做“手机控”“低头族”,则有可能迷失了做父母对孩子以及做子女对老人应尽的责任;比如玩红包,不能建立在“我就陪在你身边,你却在抢红包”的让亲情、团聚、陪伴变得暗淡的基础上;总之,数字化过年是好事,但千万莫让过年多了数字时代的喧嚣,却少了过年的喜庆与亲人团圆的意味!